

重 见

“七十子”

李 零

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
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……

（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
序）

悲愤出诗人，乱世见
思想。

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
中国是个“礼坏乐崩”（语
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《汉
书·刘歆传》引汉武帝诏
书，今多作“礼崩乐坏”）的

时代。当时出了两个最有名的思想家，一个是老子，一个是孔子。他们的后学对他们做了很多解释，也留下很多疑惑，成为咱们反复认识的传统。郭店楚简的重要性在于，它不但出土了战国写本的《老子》，还出土了多种记载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简文，把我和这两大圣人的距离拉得很近。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，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，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，那么，现在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，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。

过去，老实说，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，觉得论深刻机智，他比不上老子。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郭店楚简，上博楚简，出土最多的却是大量儒书，它们逼我重新阅读，重新思考，改变偏食的习惯，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。特别是它提醒了我，向来的思想史研究，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，就是近代以来，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，即所谓“七十子”，太不重视，认为《礼记》是汉代文献，《论语》以外，免谈孔子，老是用“孔一孟一荀”三段式讲早期儒家，把本来最重要的一段给忽略掉了。

研究早期儒学的传承，即使今天，我们也还得读《史记》的《孔子世家》和《仲尼弟子列传》（郑玄《孔子弟子目录》佚文，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，以及《孔丛子》等书也是重要参考）。从前，我总纳闷，孔子当年，既无班级编制，又无课堂讲授，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二（或七十七），他教得过来吗？后来才知道，古代的教学制度和今天不一样，当时的老

师,他们的学生是由三部分人构成。一种是登堂入室,亲炙师教者,是所谓“受业”、“及门”、“入室”的弟子。一种是登记在册,不一定能见到老师,而由前者辗转传授,则是所谓“编牒”、“著录”、“在籍”的弟子。还有一些,只是“仰慕虚名、借资声气”的热心追随者,除了“大会都讲”,站在远处观望,一睹大师丰采,其实学不到什么(参看:吕思勉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,上册,675—678页:“讲学者不亲授”条)。所谓“仲尼弟子”,当是包括了这一大堆学生。比如,以东汉的情况而论,据吕思勉先生讲,当时的大师,他们的第一种学生都是动以千计,第二种学生也在万人以上。西汉和西汉以前,情况还没这么热闹,但以古代的制度考虑,孔子有七十多个学生和三千多名追随者,倒也并非不可想像。

孔子的弟子到底有多少,司马迁兼载异说,一种是“七十七人”说,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。他写此传,参考过一本书,就是讲孔门师承的《弟子籍》。这本书是出自孔壁的战国写本,当是孔门原来的说法(《孔子家语》的记载也是七十七人,但却以“七十二弟子解”题篇)。他是根据这个花名册,再加上《论语》的有关记述,然后写成此传。在这篇列传中,他一上来就说“孔子曰: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(注意:它是以“七十有七人”为受业弟子),估计就是出自《弟子籍》。另一种是“七十二人”说,则见《孔子世家》。《孔子世家》说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,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(注意:它是以“七十有二人”为身通六艺者)。这种说法也有较早的来源。如汉景帝时,蜀郡太守文翁刻过一套《文翁礼殿图》(即以此为主题的很多汉画像石所本),上面的弟子就是七十二人(“七十二”是凑“五行之数”)。此外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孔子徒人图法》,以及后来的《孔子家语》,它们也都记载了这批弟子。

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,孔子的学生,见于《论语》等书,可以考见其年龄、姓名和受业情况的,只有三十五人,还不到一半。他们当中最出名的,是以“德行”著称的颜回(子渊)、闵损(子骞)、冉耕(伯牛)、冉雍(仲弓),以“政事”著称的冉求(子有)、仲由(子路),以“言语”著称的宰予(子我)、端木赐(子贡),以“文学”著称的言偃(子游)、卜商(子夏),即所谓“四科十哲”。但这些弟子,他们好像都没有著作传世。相反,名气小一

点的其他二十五人,他们中的某些人,后来倒是自立门派,有不少追随者,也有著作传世,如颛孙师(子张),后世有“子张之儒”;曾参(子舆),司马迁曾说曾参作《孝经》,《汉志》有《曾子》;宓不齐(子贱),《汉志》有《宓子》;漆雕启(子开),后世有“漆雕氏之儒”,《汉志》有《漆雕子》。另外,不在这批弟子当中,但活动时间相近,还有孔子的后代孔伋(子思),后世有“子思之儒”,司马迁说子思作《中庸》,《汉志》有《子思子》。战国晚期的“儒家八派”,就是从“七十子”发展而来:“子张之儒”、“子思之儒”,无疑义。“孟氏之儒”是孟子的学派,“漆雕氏之儒”是漆雕启的学派,“孙氏之儒”是荀子的学派,也不成问题。“仲良氏之儒”是仲梁子的学派,“乐正氏之儒”是乐正子春的学派。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,仲梁子可能也是,他们都是传曾子之学,这点也还算清楚。惟“颜氏之儒”,多以为是颜回的学派,则有疑问。案孔门弟子以“颜”为氏者有九,未必即颜回。又据上博楚简,言游之“言”与颜回之“颜”无别,它也可能是言游的学派。我们从古书引用的情况看,战国中晚期,儒家的主要派别可能是子张、曾子、子思、言游、漆雕启,以及孟子、荀子的学派。儒家八派无子夏,是一大疑问。

研究“七十子”,过去可以利用的资源,除去《论语》,主要是汉人传授的大小戴记(即《大戴礼》和《礼记》)。这批“记”的来源是孔壁《古文记》。它们的内容很不一样(刘向《别录》把《礼记》分成十类),其中有不少讲礼仪制度的篇章(属刘向分类的“制度”、“明堂阴阳记”、“世子法”、“子法”、“丧服”、“祭祀”、“吉礼”、“吉事”八类),所以曾被当作解释“礼经”(即《仪礼》)的参考资料,称为“礼记”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两批文献中,还有不少篇章是记孔子之言,或孔子与七十子的问答,或七十子本身的著作(主要集中于刘向分类的“通论”、“乐记”两类,但其他几类也有相关内容),与《论语》相似而篇幅较长。比如曾子和子思的作品,就是赖以相传,保存到现在。

在前人的研究中,通过发掘“七十子”,重建所谓儒家“道统”,最有名是晚近影响很大的宋明理学。他们的开掘资源主要就是大小戴记。如宋杨简辑《先圣大训》,薛据辑《孔子集语》,汪晫辑《曾子》、《子思子》(他们的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辑本,而是一种带有新编性质的主题摘

录本),以及朱熹收入《四书》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(他认为《大学》是曾子的作品,《中庸》是子思的作品),它们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两本书。宋人认为,孔子之学的嫡传是颜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(见朱熹《大学章句序》、《中庸章句序》),但颜回无书,有书者只有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。他们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“四书”,就是体现这种“道统”。近年来,有些学者重新收集《论语》以外的孔子言论或有关记述,重新整理孔门弟子的有关资料(如李启谦等《孔子资料汇编》和《孔子弟子资料汇编》,山东友谊书社一九九一年版),仍然未能脱其范围。

所以,不可避免的是,现在研究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学生,宋学还是人手处。

当然,现在研究“七十子”,我们又有不少新资料,宋人看不到。这就是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。

在郭店楚简的十八篇中,我们读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“说话人”。惟一有“说话人”的,是《缙衣》和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。前者有“孔子”,后者有“子思”(该篇中的“成孙弋”,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人)。学者认为,这批竹简主要是子思本人或子思学派的作品。这种说法对不对,或者哪些篇是,哪些篇不是,这个问题还可讨论,但它们反映的主要是“七十子”的东西,或“七十子”时期的东西,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,我完全同意。

在数量更大,现在还没公布的上博楚简中,我们也发现了很多《孔子世家》和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的人物,如颜回、仲弓、子路、子贡、子游、子夏、曾子、子羔、子思等人,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。它们是“七十子”的东西,这点更明显。

另外,这两批竹简,它们都有与今大小戴记相同的篇章,如上博楚简的《武王践祚》和《内礼》,见于《大戴礼》(前者是据《大戴礼》题篇,后者有自己的题名,但相当《大戴礼》的《曾子立孝》);《孔子闲居》和《缙衣》,则见于《礼记》(都是据《礼记》题篇)。郭店楚简也有类似的《缙衣》篇。

总之,如果我们不再疑神疑鬼,我们应该相信,我们碰上的正是“七十子”或与“七十子”有关的作品。这是我们的福气。

读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,我们不难发现,它们不但有与《论语》相似的辞句,而且和大小戴记也有密切关系。学者的大量考证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所以,谈到对郭店楚简的印象,很多人都认为,现在的发现证实,宋明理学才找到了儒家的本源。对这个问题,我的看法有点不同。

第一,我认为,孔子的一生有多面性,他既有道德追求,也有事功考虑。过去,大家对他有一些固定印象,比如说,他不讲“怪力乱神”,也罕言“天道性命”(和道家爱谈宇宙论和养生问题形成对比),兴趣更多是在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。他更关心现实问题、世俗问题,而不是宗教问题、哲学问题,这不能说是虚构。但他的思想还是包含了多种发展的可能(比如他说“性相近,习相远也”,就涉及到心性问题)。他的后学,出身背景不同,性格志趣各异,本身也有各自的选择。不但“七十子”和他们的老师不一样,而且“七十子”之间,“七十子”与“儒家八派”,他们也不一样。很多问题是,老师不讲学生讲;或老师语焉不详,学生大肆发挥。宋儒以孔子传曾子,曾子传子思,子思传孟子,建立道统,强调其心性之学,强调其道德修养,这当然有重要意义,甚至可以说是重要发现,但这只能说是发现了早期儒家的一个侧面,或一条线索,而不是它的全部,更不是它的主流。我相信,一个两千多年被人反复解释的孔子,不可能是一个有固定面貌的孔子。

第二,战国秦汉的儒学是以政治关怀为中心,这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侧面。虽然孔子当年,他在政治上不太得意,所以对讲求德行的弟子更偏爱,但孔子死后,“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,大者为卿相师傅,小者友教士大夫”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,情况却正好相反,他的学生,真正得志的反而是长于言语、政事和文学者。当时,“子张居陈,澹台子羽居楚,子夏居西河,子贡终于齐”(同上),他的很多学生,还有学生的学生,其实都很趋时趋势,与政治潮流有密切合作。比如子夏对三晋地区的法术传统(这个传统后来被商鞅传播到秦国),还有好谈制度,传帝王术给韩非、李斯的荀卿,就有很大影响。战国晚期,流行刑名法术和阴阳五行,儒家与这类学术对话(利用儒家典籍中的亲缘成分),也主要是制度派,而不是道德派。他们的所作所为,虽未必合于孔子本人的理想,但却是战国秦汉儒学发展的主流。当时,颜回一流的人物,只能“隐而不见”(同

上),人数很少,而且吃不开。

第三,宋儒的建立道统,是违反原来的主流,重张孔子思想被掩盖的部分,变支流为主流,情况正如汉初道家从刑名法术重返清静无为。战国秦汉,儒家讲制度太多,在宗教、哲学问题面前,本来就捉襟见肘;而魏晋隋唐,又遇释道挑战,在这些精致的思想体系面前,也难免相形见绌。这是宋代学术发生重大转机的历史背景。但他们的“复古”,与其说是“复古”,不如说是“托古”。他们真正复原的恐怕还是他们心中的古代,而不是本来的古代。比如现在,以郭店楚简为例,我们碰到的情况好像是,儒家本来关心的就是天道和心性,而且对超越性的问题也饶有兴趣。这对不对呢?似乎比较对。但我们不要忘记,郭店是局部,而不是全体,在上博楚简中,早期儒家的面貌要比这复杂的多。更何况,我们就是把上博楚简加上去,它反映的也还是局部。我们应当看到,儒家在汉代之所以跃居主流,孔子之所以被历代尊崇,关键并不在于它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和抗辩,也不在于它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和同情,而是在于它与制度的结合,特别是与文官政治和仕途经济的结合。它对“天”的关心,主要还是作为政治命运的关心;它对“人”的关心,也主要是作为政治动物的关心(案:秦汉之际的制度创设,每一步都伴有儒家的反动。秦始皇统一天下,本来是想三统一:统一制度,统一宗教,统一学术,一步到位。但他做到的只是一条半,即车书一统和二百祠畤。他请儒生、方士兴太平,双方闹翻,统一学术宣告失败。这是第一步。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还是统一学术;巡狩封禅,兴立祠畤,还是统一宗教,仍然是做秦始皇没有完成的事。但他完成的只是学术统一,宗教统一,遭王莽反对,被大打折扣。东汉以来,宗教失控,乃有民间借术立教的高潮,终于导致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引入)。

总之,当我们为郭店楚简的发现而欢呼雀跃时,我们千万不要忘记,我们的研究仅只是管窥蠡测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一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(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;《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》、《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》、《荆门郭店楚简中的〈子思子〉》,李学勤著,收入《郭店楚简研究》(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),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;《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》,姜广辉著,收入《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》(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一辑),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)